

土耳其
現代簡明史

米列爾著

目 录

导言	1—8
第一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土耳其	9—75
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的土耳其	9
二 土耳其的参战	23
三 协约国关于瓜分土耳其的秘密协定	52
四 奥托曼帝国的崩溃	71
第二章 安那托利亚的民族解放运动和独立战争	76—137
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土耳其的结果	76
二 协约国在近东的政策。土耳其的被占领	81
三 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土耳其的影响	87
四 安那托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产生	89
五 穆斯塔法·基馬尔和民族政权的組成	92
六 英希武装干涉和基馬尔党人的胜利	106
第三章 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	138—165
一 木达尼亚停战协定	138
二 苏丹制度的廢除	140
三 洛桑會議	144
四 共和国的宣告成立和哈里法制度的廢除	162
第四章 基馬尔党人为爭取国内的政治壟断地位 而斗争	166—191
一 文化和生活方面的改革。反动分子的反抗	166
二 基馬尔党人与买办分子的接近。人民共和党壟断 地位的确立	176

三 工人階級和農民的情況	183
第五章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夜和戰時的土耳其	192—239
一 蒙特羅會議	192
二 土耳其政策的轉變	201
三 亞歷山大勒達州問題	206
四 基馬爾黨內部的鬥爭。阿塔丘爾克之死	212
五 土耳其與第二次世界大戰	220
結束語	240—257
史料和參考書目錄	258—283
大事年表	284—309

导 言

本書的年代範圍比近代史和現代史分期法所規定的範圍稍廣；“簡明史”不是從一九一八年開始，而是從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開始；此外書前又加了一個簡短的引言，闡明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四年土耳其的內部狀況。作者之所以不得不違背分期法，首先是因為安那托利亞民族解放運動的前提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產生的，同時也由於必須對土耳其的半殖民地狀況作一個即使是簡單的敘述，否則便不能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產生的反帝鬥爭。

可供研究土耳其現代史的史料是很貧乏而且相互矛盾的。除了對於任何一個資產階級國家現代史所能提出的共同意見（缺乏已公布的檔案材料和弄不到未公布的材料，傳記和政論著作的傾向性，直接的偽造）以外，還應當指出有關東方各國現代史的若干特點。不僅東方各國的現代史，就是近代史也是一門最少研究的學科。斯大林、日丹諾夫和基洛夫等同志對近代史教科書綱要所提的具有歷史意義的意見，第一次給我們提出了一個任務：把附屬國和殖民地的歷史作為歷史進程的主體來進行研究；從那時起已經過去十四年了，但編纂一部馬克思主義的、包括十九——二十世紀的東方史的任務還遠未完成，並且在這方面史料的特殊性乃是最重大的困難之一。關於土耳其的現代史首先必須注意的是，對於其它國家算是普通的材料，如國會的報告，各個政黨在代表大會和會議上的辯論，政治和社會活動家的傳記，大事年鑒等，直到現在甚至還沒有用土耳其文完全公布出來。只是不久以前才開始

弄到在土耳其公布的一些重要史料——阿塔丘尔克·基馬尔的演說，伊斯美特·伊涅紐的演說等。結合着以前公布的史料(其中最重要的有：基馬尔的演說，一九二七年的調查材料，各个政党的綱領，条約和协定)，这些新文件有很大的用处。可是近年以来土耳其所建立的反动制度妨碍在报刊上披露公众的輿論。民主的派別，特别是共产主义运动，常遭警察和法庭的迫害，它們實質上沒有任何合法的講壇。統計材料是由政府机关以“加工制造了的”形式公布的，这样便無法确定农村的階級分化、工人的收支情况、工業中的利潤率等。

現有的俄文和外文参考書不能完全补救这些缺陷。苏联的作者們曾对土耳其現代史上很多問題作了許多有益的和有科学根据的研究，但这类著作在数量上显然是不够的。А. Д. 諾維切夫有关土耳其經濟的几本寶貴的专著，在年代上是写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B. M. 丹澤格、И. 华西里也夫等發表在杂志和報紙上的論文对于了解土耳其的历史發展是非常有益的，但它們大多只涉及經濟和对外政策上的个别問題。有关現代时期历史的綜合性著作都过于簡單，而有时則甚至公式化。B. M. 丹澤格所著“土耳其”一書，正如本“簡明史”的作者所發表的“共和土耳其”、“土耳其”等書一样，与其說是具有历史性質，倒不如說是帶有国家志的性質，并且在很多方面都已陈旧了。M. П. 巴甫洛維奇和B. A. 古尔柯一克仰仁的著作也陈旧了，它們还是在阿塔丘尔克的“演說”以及一九二七年土耳其第一次人口、农業和工業調查結果公布以前出版的。并且以前几年在我国所發表的書籍和論文中，有些曾犯了严重的原則性和史实上的錯誤。

西欧关于新土耳其的著作較為广泛，但具有極端的傾向性。在著述有关土耳其的著作的西欧作者中，人数和作品最多的是法

国記者，他們游历土耳其，然后發表自己的印象，把从很流行的書籍和小冊子里吸取来的参考材料加到印象之中。并且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英法在土耳其問題上的矛盾，法国的記者們通常都不惜对反对英希武装干涉的土耳其人大加贊揚，而把法国描写成土耳其人的保护者。

在最有名的法国作者中，可以指出摩里斯·帕諾、波尔·讓蒂逊、剛托·比龙和勒列維兰等人，他們合著了一本十分有趣的書，还可指出史里克倫、列勒·馬尔尚，特别是柏塔·若施一戈里（見参考書索引）。对于这些法国作者來說，他們对于基馬尔党人中反动活动家的态度也是值得注意的。例如，柏塔·若施一戈里在其“安哥拉—君士坦丁堡—倫敦”一書中，簡直是歌頌列菲特巴夏的长处，歌頌他的“远見”等等，这显然是因为列菲特巴夏領導了“西方派的”、實質上是反基馬尔的集团，而后来則成为反动的买办反对派中最有名的活动家之一。柏塔·若施一戈里对他極力贊揚，因为列菲特巴夏力求建立美国对土耳其的委任統治，力求基馬尔党人与法国人勾結，这是会使民族解放运动归于失敗的。

作为一个研究土耳其的历史学家，拉穆斯也是很有名的。他的“土耳其史”出版于一九三四年。可是拉穆斯总共只以二十頁的篇幅叙述現代的土耳其，但尽管分量很少，他也沒有忘記宣揚那种只有利于外国資本家和伊斯坦布尔商人的道德。他譴責土耳其人封閉外国的教会学校，譴責土耳其共和国的“过份的保护关税制的”——如他所說的——經濟政策等等。在拉穆斯看来，土耳其是一个農業国家，只应發展農業和增加农产品，而不应考虑建立自己的工業。

在法国作者的著作中，甚至在文艺作品里，都可以發現对“古老而善良的”土耳其的过去的怀念。在那些还没有放弃对“东方風

味”的愛好(實質上在這後面便隱藏着對土耳其獨立所抱的仇視態度)的作家們中間，克洛德·法萊爾享有特殊的盛名。他的小說“殺了人的人”當時幾乎算作有關土耳其的“經典”著作。克洛德·法萊爾在書中描寫他所心愛的蘇丹土耳其，舊的奧托曼帝國及其一切特征——柏樹、斯庫塔利亞的墳地、帶面紗的婦女等等。可是在三十年代，克洛德·法萊爾又到了土耳其，這時已是新土耳其了。他在那兒所看到的一切都使他很不喜歡。他感到悲哀的是土耳其人走上了歐化的道路，沒有昔日的風味，奧托曼帝國已為土耳其共和國所代替了。在其出版於一九三三年的名為“安哥拉的四位太太”的新小說中，他以自己書中的英雄的口氣叫喊道：“這些新土耳其人還自稱民族主義者哩！摒棄過去的一切，而那是怎麼樣的過去啊！”

至於德國的作者，他們的意圖就是頌揚德國的作用。這種傾向甚至在法西斯以前時期就表現出來了。例如，庫爾特·西姆凱所著的“新土耳其”一書，雖然也可以作為參考材料，但卻為德國帝國主義辯護。作者把德國描寫為土耳其的絕對大公無私的“恩人”，好像它曾出面保全奧托曼帝國的完整和反對帝國的敵人。西姆凱特別頌揚德國在土耳其的“文化作用”。

多年以前出版了德國人李勞所著“新土耳其”一書的俄文譯本，但它沒有超出起碼的材料編纂的範圍。

奧地利的外交家諾伯特·比蕭夫所著“土耳其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一書，詳細地研究了土耳其共和國的對外政治聯繫，可是作者看來是故意地緘口不談土耳其與德奧的關係。

美國作者的書籍的傾向性主要是表現在美國自己與之有直接利害關係的那些問題上(關於石油、租借權以及一般地關於在土耳其的外國資本、威爾遜的政策等問題)。美國出版了各種關於土耳

其的手册，类如“貿易手册”，也有若干专著。一九二四年，紐約出版了一本密尔斯主編的論文集——“現代土耳其”。这是一本有用的参考書。但就在这本文集里也包含着很多具有傾向性的文章。例如，“論少年土耳其党人”一文就不能算是客觀的作品，即使是因为它是出于“哈里法陛下”私人秘書的手笔这一点。論基馬尔党人的文章是文集的編者密尔斯写的，它对基馬尔党人中力求建立美国对土耳其的委任統治、或無論如何要与西方“更为密切地接近”的那一派入怀有明显的同情。一九三九年底，美国出版了韦伯斯脫著的“阿塔丘尔克的土耳其”。書中有很多年代日期和数字，并且除若干次要的錯誤以外，材料一般地都是确切的。但是这本书也反映出美国人的意圖：粉飾土耳其的真实情况，在美国資产者面前把土耳其說成在已經开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有利于美国政客那样。显著的例子是：作者說，在土耳其根本沒有独裁，也不可能有，因为（而且这是唯一的解釋）基馬尔·阿塔丘尔克本来是能当苏丹或哈里法的，比方說，就像伊朗的列薩汗当了国王那样，但他自动地拒絕这样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在战争結束以后的年代里，美国出版的有关土耳其的書籍和文章具有更大的傾向性：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恬不知耻地为土耳其建立的反动政权作辯护，充滿了对那些为爭取自己国家从美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而斗争的土耳其民主团体的誹謗性的攻击。

英国的作者怀有露骨的傾向性，这是由于英国在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时期所扮演的角色的緣故。艾物斯萊勋爵的巨著“土耳其帝国史”中包括有关于一九一四年以后时期的几章，它們是出自名記者齐罗尔的手笔。在有关現代土耳其的一篇中，齐罗尔表现出异常的恶意。他把民族解放运动描写成少年土耳其党人的运动，并且对于盟国放过时机，未能絞杀土耳其，允許土耳其民族解

放运动的發展而感到惋惜。另一位英国作者、以其很多有关对外政策的著作而著称的唐比，与克尔克伍德合写了一大部有关土耳其的著作，書中提供了有价值的实际材料，但也作了具有很大傾向性的叙述。例如，著者把英国同意由希腊人占領伊斯密尔一事作了如下的解釋：他說，劳合·乔治当时是很天真的，他被“克里特的海上女妖”——維尼塞洛斯——迷住了，后者說服了他同意占領伊斯密尔。

阿姆斯特龙格的“灰狼”一書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应，特别是在土耳其。書中有很多有趣的細节，但它主要是打算引起庸俗性的廉价效果，充滿着有关基馬尔私生活的似不可信的报导，因此阿姆斯特龙格在其書中引用的其它事实也很值得怀疑。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出版了一个叫做賈尔曼的人所著的“土耳其”一書。它是作为“列国”丛書之一出版的，書中含有很多重大的錯誤和別具用心的歪曲，更不用說作者在方法論方面的無能了。例如，作者写道，只是巴黎条約才为商船开放了黑海，奥托曼国会“自动解散了”，而事实上它是由于英国人占領伊斯坦布尔而被解散的；他又說，哈里法制度的廢除好像是由于印度的哈里法拥护者“天真的”發动所引起的，反动的所謂“进步”党仿佛是真正进步的等等。

作者对于阿里·費特希貝伊(奥克雅尔)领导的“自由”党表示特別的同情。作者硬說这个政党之所以解散，是因为土耳其的社会輿論还没有达到进行公开討論和批評的程度。作者譴責把首都从伊斯坦布尔迁移到安卡拉。

西欧和美国有关新土耳其的著作就是如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土耳其的著作就应具有特別重大的意义。但是就在这里情况也很不順利。事实上整个土耳其的史学史都屬於半官方的范畴。

它基本上是重复基馬尔的有名的演說。可是基馬尔的演說決不符合对客观的历史研究所提出的要求。穆斯塔法·基馬尔的演說的开头第一句話是：“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九日我在薩姆松登陸”；这句話应当表明，在此以前，即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九日以前，土耳其是沒有任何民族解放运动的。当談到政治言論（基馬尔的演說就正是这种言論）的时候，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研究工作者不能以此作为土耳其全部現代史的根据。同时，以其第四卷闡述土耳其現代史的半官方的土耳其著作“历史”（Тарих）一書，不仅完全遵循基馬尔的主張，而且也几乎完全以他演說中所包含的那些事实材料为限。如果說“历史”也补充了某些新东西的話，那在很多場合下它都有意地歪曲历史事实。例如，“历史”硬說，苏維埃俄国只是当土耳其在反对希腊的战争中显示了自己的軍事威力以后，才同土耳其簽訂了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六日的条約；虽然大家都知道，条約是在“第二次伊涅紐”以前和远在薩卡里雅河战役以前簽訂的。

在記述和分析历史事件方面表現独立自主精神的土耳其作者的書籍中，应当指出女作家哈里德·艾迪布的回忆录。她的英文著作“土耳其的痛苦經歷”一書更特別有趣。可是哈里德·艾迪布由于代表伊斯坦布尔的买办的利益，她是从反动的立場批評基馬尔的政策。所以，对待哈里德·艾迪布的断語必須非常慎重。特别是她对基馬尔的关于她曾力求建立美国对土耳其的委任統治这些声明的駁斥也未必可信。

很明显，現有的关于新土耳其的著作很难尽述。在法国、英国、美国和其他国家出版了基馬尔的很多傳記；在許多杂志上曾刊載过长篇的文章；最近几年在土耳其本国也出版了几部有关現代史的書。可是它們基本上只是重复旧的东西，几乎沒有引用新材

料。土耳其的教授希克梅特·巴尤尔已着手著述一部多卷的“土耳其革命史”，并且他在序言中解釋說，“土耳其革命”一詞正应了解为基馬尔革命，即土耳其历史的現代时期。可是在已經出版的前三卷中，作者仅写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不知全書将在什么时候完成。

* * *

附在本書后面的参考書索引归納了作者所引用的史料和参考書，同时它也应帮助讀者就書中論述的問題寻找补充材料。

編制地圖和为索引以及大事年表准备材料的工作是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員 H.A. 基瑟辽夫完成的，作者对他表示謝意。

第一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土耳其

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的土耳其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奥托曼帝国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半殖民地。法国和英国的资本家在奴役奥托曼帝国方面扮演了主要角色。对奥托曼帝国也抱有侵略意图的俄罗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在帝国的经济和财政方面拥有不大的势力。从十九世纪末叶起，帝国主义的德国在土耳其开始踞居首要地位。

如果仅就数字材料来看，那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法国和英国对土耳其有决定性的影响。一九一四年，奥托曼帝国公债券的百分之八十五是属于这两个国家的（法国占百分之六十二·九，英国占百分之二十二·三）。除公债以外，在土耳其的其它外国投资（铁路、银行、公用事业、工商业企业）方面，德国的份额是很高的，它占百分之四十五·四，因为德国人把大量资本投到巴格达铁路的修建上。但就是在一九一四年总数约达八千万里拉（当时一里拉值八卢布五十四哥比）的这些外国投资中，法国仍占有百分之二十五·九，英国是百分之十六·九。

可是，这一些数字决不能机械地运用到列强在土耳其的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上。实际上，早在阿布都尔·哈米德二世统治时期，德国对土耳其的政治就有很大的影响。固然，阿布都尔·哈米德曾从各方面取得金钱，并企图利用当时存在于大国之间的矛盾。但在各种情况下，玩弄矛盾的把戏都没有使土耳其的处境轻松，它只造成某种轻松的表现——延期解决土耳其问题。而在事实上，

帝國主義國家的競爭異常痛苦地影響了奧托曼帝國的處境。

帝國主義國家都利用自己各式各樣的和非常強有力的統治手段。領事裁判權制度應放到首要地位。在過去，領事裁判權條款是由蘇丹政府以單邊形式頒發的一種證書，在那時，它並不破壞土耳其的主權。

一五三五年由蘇列曼大帝簽署并授與法國國王弗蘭西斯克一世的領事裁判權條款，是蘇丹贈與外国的最初領事裁判權條款之一。這個領事裁判權條款並不表示奧托曼帝國的軟弱，而是反映它的強大。弗蘭西斯克一世當時是較為軟弱的一方。當他還是哈布斯堡王朝的階下囚時，他就開始同土耳其人談判；正是為了同哈布斯堡王朝進行鬥爭，他才需要土耳其人的保護并與他們結成同盟。所以，蘇列曼所頒發的領事裁判權條款曾是強者贈與弱者的禮物。并且，這種領事裁判權條款以及隨後的一些，只是在頒發這些條款的蘇丹在位期間才有效力。可是，這種情況並沒有繼續多久。土耳其日漸衰落。和歐洲各國比較起來，它的經濟和政治的落后性首先是造成了實際上的、然後甚至是形式上的不平等。一七四〇年，法國從土耳其獲得了新的領事裁判權條款，這次却是永久性的、永遠鞏固了法國商人在近東的特殊優惠權的條款。

一七四〇年的領事裁判權條款是土耳其領事裁判權制度發展中的轉折點。從此以後領事裁判權條款就變成了奧托曼帝國的一項推辭不了的義務。

一七七四年在庫楚克開納琪簽訂的俄土和約中，土耳其的這種義務以條約的形式固定下來了。在條約中直截了當地規定：領事裁判權條款既已逐字逐句載入本條約，土耳其應予履行。

後來，奧托曼帝國曾締結了好幾個貿易協定，其中主要的有一八三八年同英、法兩國以及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二年同英、法、奧、

俄等国締結的協定。這些貿易協定把領事裁判權制度中的很多因素運用到土耳其與外國的貿易實踐中來了。

領事裁判權制度是土耳其經濟發展道路上的不可克服的障礙。首先，它決定了外國人不受土耳其法院的審判。刑事案件由領事法庭審理，即由有關國家的領事審理。只有同一國家的臣民參與的民事案件，也由領事審理；而同時牽涉土耳其人和外國人的案件，如果在土耳其的法院審理，則必須有有關國家大使館的翻譯官出席，即在他的監督和壓力下進行。

其次，領事裁判權制度使外國人幾乎免除土耳其國內的一切稅務。由於這個緣故，居住在土耳其領土上的外國臣民自然就比土耳其人自己處於更為有利的條件之下。外國商人能比土耳其商人以便宜很多的价格出賣自己的商品，这样就使土耳其商人的競爭陷于癱瘓狀態。尤其是在土耳其這個國家，人們很容易轉入外國籍。土耳其政府由於自己的軟弱，無法阻止這件事。外國的領事館則為了一筆適當的金錢而出賣護照。結果，形成了這樣一些“外國”臣民階層，他們從來也未到過“自己的”國家，甚至連這個國家的語言也不懂。

根據領事裁判權制度規定的低額關稅，是外國人的極重要的優惠權。計算稅收的方法本身就是不利於土耳其的。這就是所謂計值稅，即按商品的价值課稅。計值稅制度對於工業不發達的國家根本是不利的，因為它不允許區分和保护那種由於外國競爭而遭到特別損害的工業部門。但除此而外，稅收量也是微不足道的。起初，規定稅率為商品价值的百分之三——五，二十世紀時，達到了百分之八，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則達到百分之十一。在這種低微的稅率的情況下，薄弱的土耳其工業，顯然是不能同不受任何限制而大量輸入土耳其的外國工業品相競爭的。

除了領事裁判權制度以外，外國租借權也是奴役土耳其的強有力的工具。同時必須注意，外國人幾乎都不把資本投入土耳其的加工製造業中，因為他們並不關心在土耳其建立起工業企業。外國資本主要是投在鐵路修建和礦藏的開發上，部分地也投到公用事業和商業企業的經營上，投到銀行中。

奧托曼帝國的鐵路是屬於外國人所有的。希查斯鐵路是一個例外，這條鐵路是阿布都爾·哈米德二世時借德國人的幫助、用從各國伊斯蘭教徒中募集來的金錢修建的，它的使命是為泛伊斯蘭主義的（同時也是為泛日耳曼主義的）目的服務。除此以外，還有一條不大的支綫，它是土耳其的企業主修建的。外國人修建鐵路只是從他們自己的利益出發，而不從土耳其的國民經濟的利益出發。甚至鐵路的路綫也說明了這一點。土耳其的第一條鐵路是在十九世紀中葉修建的。這條鐵路把伊斯密爾和亞伊丁聯接起來，然後又從伊斯密爾延長到馬尼薩。接着又修建了從海達爾巴沙（位於博斯普魯斯海峽的亞洲海岸）到伊斯美德，然後再到愛斯克含希爾的鐵路。在地中海沿岸一帶也有一條不大的支綫——美爾星到阿達納。在土耳其的歐洲部分，所謂東方鐵路把伊斯坦布爾和中歐的鐵路綫聯接起來了。

幾乎所有這些鐵路實質上都是通向海港的支綫。它們的任務首先就在於使外國人便於把各種原料運到這些海港和在土耳其推銷外國工業品。

此外，所有這些鐵路在任何時候都能遭到外國軍艦的炮擊。因而從戰略觀點來看，這些鐵路對土耳其也是不利的。在這方面，著名的巴格達鐵路——德國企業——是和在土耳其修建起來的其他鐵路不同的。雖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巴格達鐵路尚未完工，即尚未鑽通經過塔夫爾和阿馬努斯的隧道，但就是這條鐵路也

不是为了土耳其的需要，而是为了德国的需要——作为通向波斯灣的战略要道。德国人正由于自己在同英国进行斗争，所以他们就把巴格达铁路修筑在土耳其的中心地区，离开英国军舰的炮火远一些。

这些铁路的经营方式带有典型的殖民地性质。它们是根据所谓公里保障制经营的；按照这种制度，土耳其政府负责对每一公里铁路支付一定数额的金钱，不论铁路是否带来相应的收入。在这种制度下，外国租借者就不去关心提高铁路的赢利性；不采取增加和改进車輛的措施，也不关心降低运价，因为他的收入反正是有保障的。例如，在亚伊丁地区，有很长一个时期骆驼运输業就曾順利地同铁路进行竞争，因为前者运费便宜得多，而归根结底又较铁路为快，这种情况是不足为奇的。

在外国人所获得的开发土耳其矿藏的租借企业中，最重要的是厄里格利—桑古尔达克（在黑海上）区的煤矿租借企业。这是土耳其唯一的煤矿区，它完全属于外国资本家、主要是法国资本家所有。后来在那里也出现了意大利的资本家。

安那托利亚的西部（亚伊丁，班登馬等地区）富有各种矿藏。这里有炼鋼工業極為珍貴的鉻，有鉛和若干数量的鋅。最后，这里还蕴藏着大量的金剛砂。这个地区的矿井几乎无一例外地属于外国人，埃尔加尼地区的銅矿也属于他们。地質勘测工作同样也操在外国人的手里。

几乎所有土耳其的大的（就当时来说）公用事業——伊斯坦布尔的自来水、电車、伊斯坦布尔的馬車[○]等等——都属于外国人。法国人拥有極其重要的租借权——烟草专卖权，即“奥托曼帝国烟草

○ 此处馬車是指在汽车和电車發明以前都市里行駛于軌道之上的馬車。——譯者

专卖权”(土耳其人通常把它簡称为“列热”),它控制了烟草、烟草制品的全部生产和出口。

外国銀行是奴役土耳其的有效工具之一。其中最主要的是奥托曼帝国銀行。它只在名称上是奥托曼的。实际上英国和法国的資本在这个銀行里占統治地位。該銀行有發行貨幣的权利。它还以土耳其的名义借貸外債。在二十世紀,德国的“德意志銀行”成了奥托曼銀行的勁敌,少年土耳其党人曾通过它在德国借了几次外債。除阿布都尔·哈米德二世統治时創办的仅有的一个农業銀行以外,土耳其当时是沒有本国銀行的,而这个农業銀行又軟弱到这种程度,它甚至沒有固定資本。

对外貿易也是奴役土耳其的一个工具。它是帶有不等价性質的:廉价收买土耳其的原料,而外国商品在土耳其出賣的价格則比在其他国家昂貴。对外貿易实际上是被土耳其的港口城市——伊斯坦布尔、伊斯密尔、貝魯特、特拉布松——的外国人和外国买办壟断了。在奥托曼帝国,买办資產階級是在外国人及其在当地商人中的“被保护人”所享受的特权基础上形成的。在土耳其出現最早的英、法資本家,首先利用了希腊和阿尔明尼亚的商業資產階級作为买办代理人。德国資本家出現在土耳其比英、法資本家較晚,他們也需要有自己的买办。由于希腊和阿尔明尼亚的資產階級已經同英国人和法国人有了牢固的联系,所以德国人为了自己的目的便开始从已經产生了的土耳其資產階級中間培养买办資產階級。正因为如此,所以,当由于一九〇八年資產階級革命而掌握政权的少年土耳其党人自己鼓励买办商業的时候,就出現了这样一个情况,正是土耳其(就其民族而言)的买办同德国資本家有着最密切的联系,而这也促进了德国人对少年土耳其党人政府的政治影响的加强。但是,就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那个时期來說,还不應該夸